

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OSI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INSTITUTIONS

赵可金◎著

时事出版社



王雪莲教育基金资助出版



王雪莲教育基金资助出版

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OSI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INSTITUTIONS

赵可金 ©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赵可金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80232-487-9

I. ①当… II. ①赵… III. ①外交 - 制度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1715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1.75 字数: 483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转型中的中国外交与外交学

倪世雄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

环顾世界，变革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巨大变化。时至今日，已经很难用一个词来表达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当人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再停留在仅仅谈论全球化，谈论美国霸权，谈论中国崛起，而是越来越习惯于在谈论某一个问题的時候，把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问题集中在一起，从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经贸摩擦、股市行情、价格波动、新兴市场，一直到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航天飞机、火星探测、社会运动等，几乎在所有专家的发言中，都能听到上述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专家和通才互需共聚的时代。

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1999年出版的著作《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车与橄榄树》中提出，在以“凌志车”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推动下，以“橄榄树”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必定抵挡不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他在近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进一步认为世界已经被铲平，人类社会进入了“以个人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2.0版本时代”，合作与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或许弗里德曼的观点有些过于激进，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巨

人变革确是毋庸置疑的。诚如十七大报告所言：“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置身于全球化时代变革的潮流中，如何有效应对全球性变革，是当今世界包括国家、企业、个人在内的所有行为体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时下，诸如新经济、新政治、新文明、新外交、新安全、新哲学、新发展等各个领域的“新学”兴起，其核心就是探讨全球大变革，力图揭示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

在全球性变革的洪流中，中国外交也处于不断的转型和调整之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之中，而且资本主义力量在当今世界居于优势地位。在 1991 年之前，由于苏联和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世界呈现为两极格局。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形成的“苏东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换过程之中。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谋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毋庸置疑，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的一个首要使命就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但是，我们还必须学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通过吸取资本主义肌体上的营养，以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因此，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外交上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和平环境，是新中国外交研究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历史课题。作为学者，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大胆推进中国外交研究，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外交学。

建立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苦心孤诣的目标所在。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早在 1949 年 11 月 8 日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建国 60 多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自己

的独立和主权，为中国发展谋求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取得了重大成就，塑造了中国外交的特色与独特风格。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外交存在的历史方位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无论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和封闭落后的国家，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参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国家。建国以来 60 多年的外交实践为中国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如何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外交理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外交学理论，对于推动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的转型和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也是我们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赵可金同志的《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一书就是在总结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探讨新中国外交转型与变革的一部力作。作者从全球大变革的宏观视野审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外交制度的缘起、创建、发展和变迁的一般规律，着力在理论上以合理性为“经”，以合法性为“纬”，建立了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分析模型，得出了外交制度变迁的一系列结论。比如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世界结构，决定了革命是新中国外交制度建立的必由之路；落后国家的基本社会特征，决定了中国外交制度建设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现代政党（亦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建国的政治逻辑，决定了外交制度建设内在意识形态逻辑和制度合理性逻辑的张力，进而决定中国外交制度的成长具有自我强化的制度变迁和自我闭锁的制度变迁两种路径；现代外交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取决于制度精神的社会化；中国的现代外交制度成长历程，是一条从具体国情出发的渐进改革道路；等等。这些结论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可金同志的新著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人办外交的一些基本规则，弥补了外交学研究中对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的不足。该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丰富的史料支持。作者查阅了中国外交解密档案、俄罗斯外交解密档案，阅读了大量领导人和外交官传记、回忆录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走访了大批重大外交事件亲历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

资料。许多资料具有较强的史学价值。二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作者并非仅仅考据史料，而是在鉴别史料真伪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理论探索，以合理性与合法性张力的社会学问题为主线，分析了新中国外交制度从路径闭锁到路径依赖转换的变迁逻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三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对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考察，得出了中国外交制度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战略，在巩固现代外交制度的基础上，平衡好现代外交制度与后现代外交制度建设的关系，积极稳妥地推进外交制度改革。这一看法对于今后中国的外交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作为对外交制度的初步研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作者在史料考据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史料挖掘还不够，较多引证了西方学者的著作。在理论上作者过多涉及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而对新中国外交制度特别是外交行政制度变迁的特殊规律研究不够，许多研究过多局限于正式制度层面，在非正式制度、规范和惯例方面的研究还显得不够充分。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加以研究。

中国外交制度改革是一个颇具难度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令全世界学术界着迷的重要课题。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就达到了相对比较成熟的水平。管仲之尊王攘夷，苏、张之合纵连横，范雎之远交近攻，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的华夏王朝得以巩固，中国对外关系被纳入了独特的朝贡体系，在长期的统一王朝下，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曾建立起特殊形态的交往模式，史称“华夷秩序”。长期以来，传统中国的外交使者足迹远至亚洲、非洲和欧洲，成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影响最为广泛的中华帝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外交制度要比现代西方国家的外交制度还要久远，还要成熟。18世纪以降，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东西方文明体系发生正面碰撞。中国由于没有及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在这场“文明的撞击”中处于下风。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了“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外交境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结束1840年以来一个世纪屈辱外交的全新开始。在历经各种磨难和曲折经历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近代以来的失败教训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苏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

地处理一切外交事务，使中国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随着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国必须长期与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国际社会和平相处，要想实现中国和平发展，就必须进行外交制度的变革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不过，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尽管中国可以在体制和机制上实现与国际主流游戏规则的接轨，但是在价值原则和文化脉络上却始终无法回避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国利益/世界利益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使中国外交制度改革显得异常复杂和敏感。如何妥善解决外交制度变革中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难题？如何推动中国外交转型？如何定位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上升的中国外交？所有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理论任务。

赵可金是我的博士生，也是多年来少有的得意弟子。还在他博士求学期间，我就经常同他交流切磋。他思想活跃，对新生事物接受快，而且很喜欢理论思考，能够在各种理论中博采众长，读者完全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中看到 he 跨越樊篱、自成一家的特点。他毕业后，成为我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同事，也是我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有了更多机会讨论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体制问题，我每每从他的言谈和近作中感受到新一代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的朝气和锐气。后来，他调离复旦大学，我很难过。但看到他在北京事业红火，也很为他高兴。他的博士论文原本被评选为 2006 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如今修改定稿得以出版，蒙他盛情相邀作序，并希望他继续努力登上学术研究的新高峰。当然，作为他的老师，也可能没有看到他的一些缺点，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我们都会非常感激。

2011 年 3 月 20 日

目 录

序	倪世雄 (1)
---------	---------

导论 国家建设与现代外交制度的成长：对中国的意义	(1)
--------------------------------	-----

第一章 中国外交制度的过程：理论分析模型的构建	(44)
-------------------------------	------

第一节 外交制度过程：一般框架分析	(44)
-------------------------	------

第二节 历史—社会—文化—世界：新中国外交制度的 生态视野	(51)
--	------

第三节 政党—国家—社会：新中国外交制度的政治制度依托 ...	(55)
---------------------------------	------

第四节 价值—思想—原则：新中国外交制度的隐形构造	(58)
---------------------------------	------

第五节 合理性—合法性的重构：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 动力机制	(62)
---	------

小 结	(67)
-----------	------

第二章 新中国的国家目标与革命外交价值原则的确立	(68)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事制度的成长	(70)
--------------------------	------

第二节 师法苏俄的社会主义与新中国外交价值原则的 内在矛盾	(83)
--	------

第三节 从“三大决策”到“五项原则”：外交价值系统的 合理化	(88)
---	------

第四节	中国外交价值系统的基础和根源：总结与评价	(95)
小 结		(99)
第三章	外交价值系统的法理化与党管外交体制的确立	(101)
第一节	外交价值系统的法理化与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基础革命 ..	(101)
第二节	党管外交原则的确立：新中国外交组织体制的成长 ..	(110)
第三节	克里斯玛权威的辐射：新中国外交制度的人格结构 ..	(122)
第四节	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决策制度：党委制与圈阅制	(132)
第五节	新中国外交组织体制评估	(139)
小 结		(146)
第四章	外事无小事：新中国外交制度的运行机制	(148)
第一节	外事无小事：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的指导原则	(149)
第二节	竞争中的合作：新中国外交制度的竞争协调机制	(154)
第三节	动员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交错：新中国外交制度 激励机制	(159)
第四节	党性与派性的折冲：新中国外交制度约束机制	(170)
第五节	强外交·弱制度：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评估	(176)
小 结		(184)
第五章	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实践悖论及其挑战	(186)
第一节	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实践悖论	(187)
第二节	1956 年之后新中国外交制度面临的挑战	(191)
第三节	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路径闭锁与中国外交的危机	(200)
第四节	“文革”期间外交制度的修补与中国外交格局的 第三轮拓展	(217)
小 结		(225)

第六章 国家目标的重新确定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

外交道路	(227)
第一节 路径依赖与中国外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	(229)
第二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回归现代化逻辑的外交 价值取向	(241)
第三节 新国家目标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外交道路的确立	(247)
第四节 回归“现实主义”：新中国外交原则重构的 贡献与缺失	(253)
小 结	(258)

第七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民主成长与外交体制重整

第一节 外交权威转型：邓小平外交权威与外交领导体制的 新特点	(261)
第二节 党政分开的改革与外交组织体制的重整	(278)
第三节 推动新中国外交组织体制制度化的动力	(306)
小 结	(314)

第八章 外交决策体制的制度化与决策模式创新

第一节 组织增生与惯例巩固：外交决策过程的制度化	(316)
第二节 专业化与确定化：中国外交决策的模式问题	(327)
第三节 外交政策思想库的成长及其外交决策 的制度化要求	(335)
第四节 非专家主义的政治博弈：公共舆论的成长 及其制度化诉求	(351)
第五节 寻求平衡的政党、国家与社会：外交决策制度 的重构	(359)
小 结	(370)

第九章 新中国外交运行机制的分化及其挑战

第一节 硬外交、软着陆：世界政治经济变迁中的中国 外交运行机制	(372)
--	-------

第二节	外交运行机制的层化和分化引起的外交行政 多样化趋势	(387)
第三节	“外事无小事”的挑战及外交协调机制	(406)
小 结		(414)
第十章	中国外交制度模型及其范式转换	(415)
第一节	中国外交制度的模型：依赖政党的国家权威主义	(416)
第二节	中国外交制度的范式转换：渐进性制度变迁 的合理性	(424)
第三节	现代外交制度新范式的需求：全球化背景下的 外交制度的挑战	(435)
小 结		(445)
结论	历史发展、制度变迁与中国外交制度建设的道路 ...	(446)
一	历史发展与制度成长：中国外交制度大历史	(447)
二	制度变迁与外交绩效：现代外交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	(451)
三	制度变迁与中国特色：中国外交制度建设道路	(455)
四	学术创新与研究启发：一项纯学术的思索	(458)
参考文献		(461)
后 记		(488)

导 论

国家建设与现代外交制度的成长： 对中国的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新中国脱胎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新中国成立伊始，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面临着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多重任务。其中，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是新政权首先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的国家建设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国家在中国并非先发内生，而是在西方诸多现代国家的强势挤压下被迫进行后发外生的建设过程，充满了对西方国家建设模式的模仿、抵制、适应和改造等多种矛盾的交错挤压。^①

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前现代国家转变为绝对主义国家，消弭了各种领主、贵族、教会等独占的额外权力，确立了国家主权（最初主要表现为君主主权）的至高地位；第二步是在国家主权确立稳固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市民社会的成

^① 刘晔著：《知识分子与现代国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长,通过民主化的制度推进,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制度形式。^①考察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人们不难发现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存在。人们讨论现代国家时,大都指的是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国家”。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是一种组织和制度,它由无数的机构组成,国家机器的领袖(行政权威)领导和协调这些机器,并有能力或者权威为其所统治下的特定土地上的人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武力^②。因此,这里所说的现代国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组织,而是特指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制度表达形式,是为了完成现代国家职能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价值标准、组织体系和制度规范。

从制度体系构成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设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国家的国内制度建设,比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政府制度、人民参与制度等;二是现代国家的外交制度建设,比如国家主权制度、外交价值原则、外交组织体制和具体的外交行政制度等。可见,现代外交制度是现代国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西方国家,“外交一直被看作是文艺复兴时代国家诞生的标志:随着它的出现,欧洲的国际性国家体系也诞生了,在此体系中,总可以找到一个国家周边环境的弱点或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威胁之处”。^③显然,这里所说的外交实际上是指现代外交制度,并非指封建时代的传统外交形式。但是,相比现代国家的国内部分建设的研究来说,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忽视现代外交制度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外交理论和具体外交政策与外交行为的研究。中国国内学术界在现代外交制度的研究方面更是十分缺乏,不仅无法看到有分量的现代外交制度研

① 关于国家建设的研究,在西方政治学界论述很多。比如 Deadalus, “Reconstructing Nations and States”, *Special Issue*, vol. 122, no. 3 (Summer 1993); Gordon B. Smith, ed., *State - Building in Russia: The Yeltsin Leg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Taras Kuzio,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New York: Rutledge, 1998); Taras Kuzio, Robert S. Kravchuk and Paul D'Anieri, eds., *State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in Ukrain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and, Jill A. Irvine, “Ultra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State Building in Croatia, 1990 - 1996”, *Problems of Post - Communism*, vol. 44, no. 4 (July/August 1997)。

②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 156.

③ 周启朋等编译:《国外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究的专著，甚至连专门研究外交制度的论文都十分少见，偶尔可以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看到介绍外交制度的片断，这与中国拥有 13 亿人口和年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鉴于中国国家建设的实践需要和学术界研究相对短缺的理论需要，笔者选择将新中国外交制度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

一、选题：从制度角度研究新中国外交

究竟为什么选择从制度角度研究新中国的外交？这是几乎每一个在听到这个题目之后的人首先提出的问题。研究新中国外交可以有许多角度，比如外交政策及其外交行为的角度^①、外交决策过程的角度^②、对外关系史的角度^③、外交个案的角度^④等。尽管不能说这些角度都是片面的，但的确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缺陷，特别是缺乏对新中国外交逻辑的整体理解，缺乏对新中国外交之所以“新”的特征之深刻把握。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与以往外交的明显区别，并十分豪迈地提出了建立新中国外交学的任务，认为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旧中国外交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

① 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新中国的外交，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做法。尽管我们不能称这种研究过于短视和功利，至少说明人们对于新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关注程度是非常高的。对于政策的关注程度取决于政策对利益调整和分配影响的直接程度，但是比政策更重要的是决定政策的背景因素和过程因素。

② 从外交决策过程的角度研究新中国的外交，是西方学术界外交研究的一个热点。西方一些大学的中国外交课程往往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外交政策；二是外交决策过程。

③ 从对外关系史的角度研究新中国外交，是国内学术界比较普遍而且比较权威的做法，这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最初脱胎于历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此种研究角度强调的是对外关系史，是政策研究和外交行为的复合。具体参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 年版；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④ 从外交个案的角度研究新中国外交，是时下正在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前外交官，他们由于亲身参加了外交过程，对某一外交案例十分熟悉，通过整理回忆，集中对外交进行研究。

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① 新中国外交在一些具体的内容和环节上虽然与旧的外交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系，但实质上已存在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在研究新中国外交的时候，必须考虑其特有的价值追求和具有革命意义的实践规划。

同时，考察新中国的外交逻辑，仅仅考察其现象世界的发展历史和过程是远远不够的^②，必须从事物本质的抽象世界考察新中国外交成长的整体逻辑。从这一目的出发，如果仅仅停留在中国外交政策发展变化和外交关系的拓展层面，无法完成新中国外交的研究任务。

从外交政策及其行为的角度研究新中国外交，虽然能够有助于把握某一历史断面的新中国外交，但无法把握新中国外交的整体逻辑。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回顾建国以来的中国外交，变动幅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是“联苏反美”，60年代实行的是“既反美帝，又反苏修”，70年代实行的是“联美反苏”，80年代以来实行的是“既不反美、也不反苏”，有人甚至苦恼地称之为“十年一大变，逢九必变”^③。如此剧烈的外交政策调整以及如此频繁地变换外交方略，使得新中国的外交充满了惊涛骇浪和急流险滩。外国人得出结论，研究中国外交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常常是非常矛盾的，人们熟知的判断标准

① 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② 所谓从现象世界观察和思考中国外交，主要是指仅仅盯住一些具体的外交现象，或者进行溯因式分析，追究导致此类现象产生的原因，或者进行意义评估，分析考察某现象的政治后果。此类分析固然重要，但缺点是无法把握外交发生发展的整体规律，不能有效地预测将来。

③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顾声毅教授在2003年“中国外交：理论与体制”全国讨论会上的发言。

一应用于中国就不灵了”^①。学者们尽管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探讨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前因后果，去分析某一特定时期内的中国外交，但无法把握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的不变因素，更无法确定中国外交在复杂多变中所贯穿始终的整体逻辑。因此，研究新中国外交政策，不能不首先把握新中国特定的外交制度结构和独特特征。

从外交决策过程的角度研究新中国外交，虽然能够把握外交政策产生的体制架构，却无法确定外交政策产出的人格结构及其确定性程度，最终中国的外交逻辑依然是十分模糊。不少国外学者试图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但由于大量的外交档案尚未解密，仅仅依赖道听途说的片段加以拼凑，大大降低了学术的准确性和严密性。特别是国外学术界对新中国外交政策过程的研究，以讨论影响因素的“输入面”、说明政策内容以及对外关系的“输出面”以及互动影响的“反馈面”等向度的分析比较多，至于外交“决策过程面”的论述则相对较少，同时亦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分析^②。中国国内对于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主要原因是外交决策的高度封闭性和外交档案的公开性程度不够。不少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涉足。因此，在目前情境下，从该角度分析中国外交的整体逻辑，显然缺乏应有的客观条件。本书在最初开题的时候，也曾经雄心勃勃地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最终不得不放弃。

从外交史和外交个案的角度研究新中国外交，虽然能够根据时间线索或者围绕某一外交案例将客观的外交事件贯串起来，但大量历史事实的堆积往往会淹没对外交价值追求的主体性思考，也就难以从长远的“布罗代尔时段”探究新中国外交的未来蓝图，始终无法掌握新中国外交之长期规律。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强烈的价值追求，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追求共产主义。如果对新中国外交的研究仅仅着眼于对外关系发展历史的研究（当然，并非否定这种研究），往往被具体历史阶段上的某些外交权宜之计所困扰，以至于搞不清中国外交行为究竟是沿着正确的方

① [法] 弗朗索瓦·若由著：《帝国的欲望：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法国国家出版局，1994年版，第9-10页。

② [美] 艾伦·怀丁：“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方法”，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国际问题讲演集》，台北：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3年版，第38-39页。